

結 論

中山先生號召護法時，全依賴他個人的聲望，除此之外一無憑藉，當時雖有海軍艦隊表示支持，但海軍首長程璧光仍舊支持黎元洪，不願另設政府。經過中山先生再三解說，才勉強應允支持新政府。國會議員則全力響應，願意南下召開非常會議，以對抗段祺瑞的違法行爲。因此中山先生有了海軍、國會兩支外力的支持，使新政府的組織工作能順利進行。中山先生當時號召護法的目標有三：即國會、臨時約法、總統職權，都是法律上的基本問題，他要求北京政府對這三個基本原則作確實的讓步，否則南北雙方只有宣告分裂。全國無法統一的責任，必須由違法的北京政府負責。廣州軍政府除了以政治號召全國人民一致反對北京政權外，另外計劃軍事行動，以進行打擊偽政府，及收復國土的工作。中山先生這種毫不妥協的強硬態度，自然引起桂系軍閥的猜忌；軍政府所在地的廣州地區，早已被桂系盤據。雖然粵省軍民一致表示歡迎中山先生及海軍以粵省爲護法基地，但桂系却在暗中打算藉著護法的口號，以脫離北洋軍閥控制的中央政府，乘機割據兩廣。桂系的私心自然不爲中山先生允許，因而發生激烈的衝突。中山先生討伐莫榮新之舉動，即是教訓桂系之狂妄行爲，令其了解當尊重軍政府及大元帥，但是却得相反的結果，桂系與革命黨之間的和諧關係，漸漸呈現破裂的跡象。桂系運用和平政變的手段，先控制國會，再將中山先生逐出軍政府，然後開始進行出賣護法運動的工作。

護法討逆運動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即是武力討伐，因此中山先生號令西南護法省區進行軍事行動，但桂系軍閥只願進行有限的戰爭，取得有限的勝利。陸榮廷只想暫時確保兩廣的已有地盤，而不願真正和北洋軍閥展開殊死之戰。當湘戰爆發之後

，桂系幾乎把北洋軍全部驅出湘境之外，但桂系却在此刻停止前進，表示願意與北方進行和談，桂系想乘著戰勝之時要求湘省作為兩廣的門戶，好遂其大廣西地方主義的美夢，不料段祺瑞的武力派再度擡頭，派兵增援，一舉攻下衡陽以北，桂系於慘敗之餘只得放棄湘省，發出求和的哀鳴；北方此時因直皖內部的衝突，主戰的皖系再度失敗，徐世昌以和事佬的姿態登上總統寶座，調和內爭。由於徐氏亦是主張用和平手腕來解決南北分裂的問題，因此和平會議便在外交團全力敦促下，及全國輿論的呼籲中，在上海召開了。

軍政府落入桂系的手中後，岑春煊開始進行他的和平主義，與北京政府代表在上海進行南北和會。但是南方反對桂系的潛勢力仍極為龐大，唐紹儀總代表實際上還是支持中山先生的護法原則，因此南北雙方在法律問題上造成僵局。和會較重要的意義乃是造成南北內部的再分化。因為西南護法省區見桂系暗謀私利的行為已表面化，便開始對軍政府感到失望；滇系見桂系在粵省內部處心積慮地想造成軍事獨霸，利益獨享的局面，乃起而反抗；滇桂的分裂，間接破壞粵省內軍事合作的關係。而國會議員也不滿桂系在暗中出賣國會的行為，國會內部因此發生派系的爭鬥，也影響了西南政局的轉化。因軍政府成立的法律根源即是依賴國會的支持，國會為制止桂系的不法行為，乃提出彈劾岑春煊案，但不為桂系及政學會接受，國會顏面盡失，便宣告與桂系破裂；至此，軍政府原來賴以號召人心的國會，滇軍及國內名士均一一離去，軍政府竟分裂成滬粵對峙的危局。

滬粵對立，維持了半年之久，在滬的軍政府政務總裁並未正式開府視事，國會亦為開會地點爭論不休；而南方原有的軍政府仍積極進行出賣護法的勾當，留粵的國會議員大部份均是附桂的腐敗份子，他們貪圖桂系每月加發的津貼，不惜出賣自己的代表權，引起全國輿論的紛議。南方原來支持軍政府的護法省區，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再聽命軍政府的號令，於是軍政府與桂系在粵省中成了孤立的局面，但是他們依然和北方直系聯合。直系在北方已和皖系決裂，直皖戰爭發生後，直系獲勝；但是南方的桂系却敵不過中山先生一手培養出的粵軍，最後只得退出粵省，而偏

促於廣西一隅。不久，桂系發生內亂，陸榮廷被逐，而結束其風雲的政治生涯。

軍政府存在的時間計三年八個月之久，其間曾因桂系的製肘而發生改組，後因粵軍回粵而恢復，其經三變，中山先生一直堅持他的護法原則，絕不願爲了革命黨的私利，而出賣國家民族的權益，此與當時全國瀰漫的妥協與出賣的軍閥行爲有絕大的不同，也由此反應出中山先生愛國救國的偉大情操。當軍政府被桂系盤據時，他爲了重振全國靡亂的人心，便隱居上海，全力撰述「孫文學說」，作爲將來革命黨救國運動的政治指標。當軍政府重回護法軍的懷抱時，中山先生也完成其思想上的重要著述，護法工作繼續向前推進。雖然軍政府結束了，但是在民國初年的政治史上却產生了相當重大的影響。

首先使全國人民認清守法精神的重要性，因中華民國是民主共和國，一切政治行爲的運作必須以法爲依歸，若有政客武人存心破壞法治的精神，則全國人民可起而攻之。雖然違法者依靠暴力爲後盾，任意毀法，而能得逞於一時，終究逃不過護法正義的誅討，桂系的失敗即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。北方段祺瑞的失勢，也是玩法者遭到全民交相共棄的結果。軍政府的建立，即在振奮人心，使人人皆知政治的正軌在法律。違法、玩法者必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及輿論、公理的指責。

其次表明了軍閥政客的不可信任，北方直系或皖系，利用和平手段或武力政策，其用心只在擴充自己的勢力及鞏固私有的地位；南方桂系、滇系及國會中的政學系亦是如此，雖然他們能一時迷惑或滿足人們求和苟且的心理，但是他們的私心是永遠不變的，當他們爲了滿足私人派系內永不間斷的索求時，必然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。但他們的陰謀不能長久地矇騙全國人民雪亮的眼睛。賣國的陰謀遲早會暴露出來，而引發正義的聲討。例如桂系、政學系暗中與直系勾結，企圖出賣護法原則的詭計被揭發後，西南護法區及國會有志人士均一致聲討其不法行爲，而造成粵軍回粵的最佳時機，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。

再者使革命黨救國愛國的熱忱深深印在全國人心中，中山先生以革命黨領袖的身份，親自領導討逆護法運動，雖然在進行中遭受不少阻礙，使護法幾乎遭到夭折

的命運，但他於艱難萬狀的困境中，以不屈不撓的大無畏精神，迎接各方面的挑戰。他率領的革命黨員也都具有此種革命的熱忱與愛國精神，使全國人民敬服不已。而且，革命黨所提出的護法號召，並非爲了黨中的私利，而是爲維護法治精神，爲保持中華民族的國格，因此粵省重新成爲革命黨的根據地後，便開始積極進行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工作。粵省並不像國內其他被軍閥割據下的省區，遭受被強奪虜掠的命運，而真正的成爲革命的搖籃。中山先生堅決地要求國內在安定與法治中，進行富強建國的工作，但是軍閥們並無此種遠大的眼光，因此只有以武力統一之，使全國都服膺他的政治原則，革命黨也以此做爲革命的目標。雖然軍政府被取消了，但是護法救國的原則依然不斷進展，最後革命軍北伐統一全國，即是以中山先生不屈不撓的精神與護法救國的原則爲指導而達成的。